



**FGS**

*Frontiers of Global Sinology*

*FGS*, Vol. 1, No. 1, 2026, pp.102-108.

Print ISSN: 3106-5503; Online ISSN: 3106-551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g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gs260110ctcl>



## 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文化旅行—— 兼论《〈红楼梦〉在日本的编译及其接受研究》

罗 弦 (Luo Xian)

**摘要：**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并非简单的文本位移，而是一场复杂的文化旅行。吴昊新著《〈红楼梦〉在日本的编译及其接受研究》聚焦于日本 1916-2017 出版的《红楼梦》编译本，全面剖析不同历史时期日本社会译介与接受《红楼梦》的动态过程。编译本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动态文本，更能敏锐地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审美取向与文化政治立场，成为观察日本现代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切口。这一研究视角不仅揭示了《红楼梦》编译背后日本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也为理解中国古典文学在跨文化改写中的再阐释提供了方法论参照。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文化旅行；《红楼梦》

**作者简介：**罗弦，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文学批评，电邮：1343548997@qq.com。

**Title:** Cultural Travel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Japan: *On A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and Recep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Japan*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Japan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a simple textual displacement, but rather as a complex process of cultural travel. Wu Hao's *A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and Recep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Japan* focuses on the compiled editions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ublished in Japan between 1916 and 2017, offer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the

novel was translated, adapted, and receiv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s a distinctive and dynamic textual form, the compiled edition is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the social currents, aesthetic orientations, and cultural-political positions of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thu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subjectivity. This approach not only illuminates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Japanese society underlying the compi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ut also offers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into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within processes of cross-cultural rewriting.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Cultural Tra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uthor Biography:** Luo Xian,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Research Direction: World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1343548997@qq.com.

## 引言

中国的古典文学植根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纵深之中，既承载着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伦理与审美经验，也构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重要的知识系谱与精神文化资源。正是在这种知识认同、文化认同与审美认同的深厚的文化基础上，中国文学得以不断向汉字文化圈及周边地区传播，并在异域语境中获得新的认知、理解与阐释。其中，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自古以来便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而又持续的文化往来。从最初以朝鲜半岛作为中介，到遣隋使、遣唐使的直接往来，再到贸易与学术交流的推动，中国的儒释道经典、诗文传统与文学著作便持续不断地传入日本社会，逐渐构成日本知识阶层与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化资源。这种跨越国界的文化旅行，并非文学文本的简单迁移，而是涉及选择、重组与意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正如萨义德所言，文化的转移“势必要涉及不同于源点的表征和体制化过程”（Said, 2009, p. 400），这也使得异域语境的文化流动与交流呈现出复杂的互动。日本作为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摄取、内化与更新，构成了观察区域文明互涉与民族主体意识形塑的绝佳窗口。

### 一

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跨越千年，其过程并非单纯的文本输入，而是经历选择、重组与再生产的复杂文化旅行。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无法确定，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四世纪左右，就已经由朝鲜半岛这一中介通道进入日本列岛。《古事记》（712）“应神天皇”一节记载“按照命令贡上来的人，名叫和迩吉师，随同这个人一起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安万侣，1979, p. 128）。《日本书纪》（720）中也有关于皇太子与王仁学习中国典籍的记载。虽在具体时间与书目上存在讹误，但仍可视为中国经典早期东传的重要象征。

进入隋唐时期，中日之间开通了直接往返的海上航道，使中国文化的传入由零散流通转向制度化引进，掀起了吸收中国文化的新时期。四次遣隋使，十九次遣唐使（到达十五次），不仅带回了律令制度与佛教经义，更充当了中国古典文学大规模传播的文化使者。与此同时，唐朝政府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以及高僧的秘密东渡弘法等，也从积极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文明向域外的辐射与分享。在

这一双向的模式下，中国古典文学与思想体系得以由表及里系统地进入日本社会，并逐步融入政治制度、教育体系与贵族文化生活之中。及至平安时代，日本权力阶级与知识阶层对于中国文化的渴求到达一个高潮时期，宋槧书籍大量流入日本。他们醉心于中国文化，以中国文明为典范，编纂了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汉籍类书《秘府略》等。同时藤原佐世所著的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籍目录学著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在九世纪末撰成，该书对当时日本官方藏书进行了系统记录与梳理，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传播的实际状况，显示出其在日本知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并不是停留在单向输入或模仿的层面，而是在日本语境中不断发生再阐释与本土转化。从《十七条宪法》遣词造句中对中国典籍的引用，到汉文诗集《怀风藻》对中国诗作的模仿，再到《万叶集》中以中国典籍为媒介的文化表达，中国文学资源成为日本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白居易文学的东传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旅行的典型案例。九世纪中期白居易诗文传入日本，受到以天皇为首的知识阶层的推崇，“成为宫廷大臣必备的文学修养”（严绍璁，1999, p. 241）。对白乐天文学的推崇并非停留在单向接受层面，而是通过具体的文学实践深度参与了日本文学形态的生成。以白居易诗歌意象为核心资源的“白体诗”由此兴起，日本文学史上的巨著《源氏物语》对白居易诗歌的吸纳与运用更是显著。《源氏物语》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还广泛地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精华，引用了中国典籍的史实，典故、成语共 185 处，涉及典籍 20 余种”（王玲，2008）。在小说的创作上，普遍认为受白居易《长恨歌》影响深远，如王占一（2021）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审美意识多个方面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进入江户时代，随着长崎贸易的繁荣与书籍流通的下移，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文化旅行路径也由贵族与僧侣阶层主导逐渐向城市庶民阶层扩展，形成以通俗文学为载体的新型传播格局。《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在这一时期广泛流行，其中《聊斋志异》等作品更是被不断翻译、改写与再创作，佐藤春夫（Haruo Satō）《偷桃子的人》与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yūnosuke）《酒虫》等故事均取材于《聊斋志异》。及至近代，日本在内外变局的推动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资源，《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等著作的传入，成为幕府启蒙的重要思想来源。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下，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不再仅是文化仰慕或知识输入，而逐渐转向与文化选择、民族认同及现代性建构密切相关的复杂过程。由此可见，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选择机制与意义再生产影响着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

进入近现代后，随着大众出版市场的成熟、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意识的强化，经典文本的跨文化流动背后的文化功能与接受逻辑亦发生结构性变化。正是在这一时段的脉络之中，《红楼梦》自十八世纪末期传入日本后所经历的翻译、编译与阐释的过程，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日本传播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个案。围绕《红楼梦》展开的编译活动不仅涉及语言的翻译转换，更深度嵌入日本近现代的文学思潮、审美取向之中，展现出近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新特征。学界对《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接受与翻译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其中吴昊的著作《〈红楼梦〉在日本的编译及其接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25）另辟蹊径以红楼编译本为重点考察对象，以全译本和评论文章为辅，联系日本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观察《红楼梦》在日本传播与接受中的特点与规律，揭示背后的制度要求、价值取向与社会受众的精神需求。基于此，以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历史传播脉络为背景，结合近现代文化语境，围绕《红楼梦》在日本的编译形态及其接受过程展开分析，有助于从文化旅行的视角揭示经典文本在跨文化流动中不断被选择、重组与再阐释的机制，并在兼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对中国古典文学海外传播模式转型的理解。

## 二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家族的兴衰为故事背景,通过对贾府日常生活的细密铺陈与人物命运的多维展开,构建出一个兼具现实深度与审美高度的文学世界,成为关照中国传统社会肌理与精神图景的百科全书。童庆炳(2005)认为其之所以以普通的题材而成为无可撼动的文学经典,主要在于其描写、叙事与抒情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同时小说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内在解构、对女性生命经验的深切书写,以及对“情”“理”之间张力的持续追问突破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呈现出鲜明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红楼梦》中所蕴含的诗学观念、哲学意蕴与宗教思想等在文学研究、思想史研究均具有持久的阐释空间。自清代点评版以来,围绕作者问题、文本结构、人物形象与思想主题等展开的研究,更是建立起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同时,《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也享有盛誉,被翻译为英、俄、日等三十余种语言传播。其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力,在不同语境中形成各具特色的接受形态。

《红楼梦》创作于十八世纪中期左右,在十八世纪末期其翻刻本就已被运送至日本长崎,这一时期的日本正处于告别近世转向近代的时代。进入日本文化视野的《红楼梦》并未依托单一的译介路径,既包括较为忠实原著的全译本,也存在大量摘译、节译以及编译本,其中摘译本、编译本、全译本等是最主要的译介形式,编译本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全译本。就译介形式及特点而言,全译本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原著的文学结构与思想内涵,服务于研究者与具备较高汉学素养的读者群体。编译本则通过对原著内容的取舍与组合,在保持基本故事框架的同时融入译者或编者的文化理解与审美判断,使《红楼梦》在日本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指向。编译本的二次创作,既促进了传播广度的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著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编译本处于精英译介与大众接受的关键位置。一方面,它依托于原著的情节资源与人物魅力,另一方面又通过突出特定主题使作品更符合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期待。因此,编译本更具文化调适性与灵活性。正是在此背景下,吴昊的《〈红楼梦〉在日本的编译及其接受研究》立足于《红楼梦》原著中所生发出的现代性因素与民族文化精神,以编译文本为核心对象,探究日本在接受、改编与阐释中国古典文学过程中对于这一现代精神的接受与改写,以此发现编译本背后隐藏的日本“民族个性与艺术规律”<sup>1</sup>(p. 2)。

作者并未将研究局限于编译者个人与文本的考据,而是将其上升到文化政治的高度,关注编译背后的权力场域,揭示翻译活动如何受限于制度要求和社会受众的精神需求。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相较于全译本,编译本因其删减与重写,更能敏锐地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审美取向及政治立场,编译本是日本时代精神的显现。其次,日本对《红楼梦》的编译与接受史,本质上是日本在追求西方现代性的背景下,如何将中国文学“他者化”并借此确立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过程。因此,作者关注的是表层的编译版本背后日本自身复杂的现代化叙事。在研究思路上,将历史纵深与个案解构结合进行立体考察,在厘清日本汉学转型的背景之下按时间顺序选代表代表性编译本进行深度的文本互文分析,揭示每一个时代重构红楼的底层逻辑。

在具体论述层面,作者以时间为纵轴,将《红楼梦》的在日编译史划分为草创期、发展期、成熟期与转型期四个阶段,并结合日本社会思想变迁与文学语境的转换进行整体关照。草创期处于大正至昭和初期,此时的日本在急速近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完成了汉学向现代中国学的转型,《红楼梦》由儒家经史子集体系之外的俗文学进入研究与改写视野。这一时期编译本数量有限却已

<sup>1</sup> 吴昊(2025):《〈红楼梦〉在日本的编译及其接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显露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太宰卫门版的编译本将《红楼梦》转化为恋爱家庭伦理小说，将小说的社会功能归结为“劝善惩恶”。作品带有强烈的中国国民性审视目的，本质是迎合“大日本帝国”气氛，使小说服务于日本近代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批判”的话语建构。发展期则处于战后初期的日本，此时的《红楼梦》不再被当作观察晚清社会的典型，而是成为克服战后虚无感与寻找自我存在的外化手段。饭塚朗《私版》的翻案式改写，以登场人物“近代的自我”特征，体现出战后知识界在重新理解中国文学的同时，也以存在主义的风格挖掘个体心灵的精神迷惘，符合这一时期日本本土的文学氛围。成熟期则大致划分为 20 世纪 50-80 年代，此时的日本经济复苏、文化自信增强，日本红学事业呈上扬趋势，编译本的数量与质量均达到高峰。石原严彻、松枝茂夫、君岛友子等人从色空观与“美”的文学两种主流阐释路径对《红楼梦》进行重新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战后左翼文学思潮强调《红楼梦》的社会批判维度，但这种文学史影响更多作用于全译本方面。在大众阅读市场中，编译本《红楼梦》更多地被作为“美”的集约型展现，体现编译背后深受日本本土时代语境与受众期待的制约。进入转型期（90 年代至今），《红楼梦》的编译活动呈现出多元化、本土化与娱乐化趋势，既有堺行夫的业余爱好者版本，也有王敏的漫画化甚至小林恭二的情色化改编文本。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关注较前一时期减弱，但享乐主义与消费文化逻辑开始深度参与文本重构。在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基础上，如何在传播的同时保持作品的内在精神内核成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小说现代传播的共同难题。纵观《红楼梦》在日本的百年编译历程，这一系列的文本变形构成了观察文化博弈的动态坐标。每一阶段的编译形态并非对原著的复刻，而是日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借由红楼叙述完成的自我文化确证。由此，吴昊通过对日本《红楼梦》编译本的考察，深入日本现代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隐秘叙事，使《红楼梦》的海外接受问题突破了版本学与接受史的传统边界，触及文学传播背后的文化权力结构与主体认同逻辑。

### 三

“所谓翻译，就是将原作中所涵盖的现实世界中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缺地从一种语言中顺利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古丹，2015），编译本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多展现译者的思想内蕴与时代精神。《〈红楼梦〉在日本的编译及其接受研究》一书以日本百余年间的《红楼梦》编译本切入点，以不同历史时期个案的编译本为材料，综合考察整体的《红楼梦》编译历史，将对作品的删减与改写视为具有解释力的文化现象。研究焦点由“是否忠于原著”转向“为何如此改写”，认为编译本文本层面的偏离，源自社会与受众多方面的影响。

在此问题意识之下，《红楼梦》的编译活动被置于日本近代国家建设与现代性转型的宏观背景之中加以审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脱亚入欧”的思想语境下，“证明日本为‘文明国’乃是近代日本的确切目的之一”（真嶋亚有，2021，p. 160），中国作为日本文化组成的重要资源被建构为需要超越的“他者”。《红楼梦》的编译与阐释，恰恰参与了这一复杂话语结构的生成过程。作为含有近代意义的作品，通过对《红楼梦》进入日本文化语境后不同历史阶段代表性编译本的文本细读，考察其充当的文化符号，吴昊揭示出中国文学文本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大众需求与市场机制的多重影响下生成，论证编译活动是权力、知识与审美共同作用的文化生产活动。无论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国民性批判、战后初期对主体性与存在问题的投射、经济高速增长期对“美”意识的强调，还是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娱乐化改变等，都说明经典文本在日本不同的历史时期服务于差异化的文化任务。另一方面，外来文学进入当地文化体系时会根据本土文学需要被再定位，因此编译作为

一种选择性呈现方式，本质是一种文化调适策略。同时，“接受美学理论的一个最大的启示，是作品只有经读者阅读后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王兆鹏，1998），读者成为文学传播中的重要一环。而编译本作者即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原著或全译本（一手材料）的接受者，同时又将自身的阐释形成文本”（p. 326），因此他们的编译活动既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又服务于日本读者的接受心理。例如将《红楼梦》简化为“恋爱”“宿命”“情色”等为核心的叙事类型，客观上削弱了原著中复杂的社会批判维度，又在一定程度将符合特定时代读者阅读兴趣的抒情色彩与审美特质等内容加以强化。通过追踪《红楼梦》在日本语境中的功能转移与价值转变，吴昊实际解释了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接受的历史动力机制。《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并非单线的影响过程，而是一个涉及文本转译、文化选择与意义再生产的复杂系统。

在此基础上，吴昊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旅行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从日本《红楼梦》的编译本考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进入异域语境后，必然面临选择与过滤，大众化的改写形态如编译本等往往比学术译本更直接反映社会思潮与文化心理。因此，关注古典文学如何被重写更能揭示传播与接受背后的文化动因，深入理解日本文化的特性。这一编译本研究路径亦为其他古典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作品皆可在这一框架下获得更系统的阐释。江户文人关亭传笑根据《聊斋志异》中的《莲香》写了小说《裋重思乱菊》，石川鸿斋的《再生奇缘花神谭》也借鉴了《聊斋志异》中的故事《香玉》，这些创作更多关注《聊斋志异》原著的奇事怪谈色彩。到了20世纪初期，对《聊斋志异》的化用则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如芥川龙之介的《酒虫》虽取材于《聊斋志异》的《酒虫》，但却将原作几百字的篇幅改写成了数千字的短篇小说。篇幅与人物的增加，不仅使作品焕发了新的生机，也展现了作品符合小说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古典小说是反映古代社会文化的一面明镜，它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中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古代社会的世态人情，勾勒出古代社会的真实画卷”（朱明霞、王明军，2025），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凭借其对社会百态的极致临摹，成为了域外读者窥探中国文明最直观的窗口。因此《红楼梦》在日本的旅行史，实质上是一部日本对中国形象持续重构的认识史。中国经典在海外的接受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中国形象”的再塑造，文学传播与文化认知建构密不可分。对中国文学作品异域传播的关注，也离不开中日之间文化关系的现实影响。因此经典文学作品在异域的旅行不仅是在讲述属于中国的故事，更是在目的地国家完成对“中国形象”的再理解与再定义。

### 结语

从文化旅行的视角出发，《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与变形不仅是文学传播与交流史的一部分，更是东亚文化互动与身份建构的具象展示。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深入考察，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典文学如何在跨文化流动中不断被再认识，也有助于深化对中日文学关系与东亚文化交流机制的理解。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Luo Xian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8-3627-8262>

## References

- 古丹 (2015): “目的论在文学翻译中的指导作用初探”, 《山东社会科学》(S2): 496-497。  
 [Gu Dan (2015).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Guiding Role of Skopos Theor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S2): 496-497. DOI: <https://doi.org/10.14112/j.cnki.37-1053/c.2015.s2.211> ]
- 安万侣 (1979): 《古事记》, 邹有恒、吕元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O no Yasumaro (1979). *Kojiki*, translated by Zou Youheng & Lyu Yuanm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真嶋亚有 (2021): 《“肤色”的忧郁: 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 宋晓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Mashima, Ayu (2021). *The Melancholy of “Skin Color”: Racial Experiences in Modern Japan*, translated by Song Xiaoyu.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爱德华·萨义德 (2009): 《世界、文本及批评家》, 李自修译。三联书店。  
 [Said, Edward (2009).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translated by Li Zixiu.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童庆炳 (2005): “《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 《中国比较文学》(04): 41-55。  
 [Tong Qingbing (2005).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Red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iz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04): 41-55.]
- 吴昊 (2025): 《〈红楼梦〉在日本的编译及其接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Wu Hao (2025). *A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and Recep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Jap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王玲 (2008): “《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亲缘关系”,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05): 55-57。  
 [Wang Ling (2008). “Affinities Between *Tale of Genji*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05): 55-57.]
- 王兆鹏 (1998): “传播与接受: 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 《江海学刊》(03): 142-146。  
 [Wang Zhaopeng (1998). “Communication and Reception: Two Other Dimensions of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03): 142-146.]
- 王占一 (2021): “论互文视野下的《源氏物语》与《长恨歌》”,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 47-53+158。  
 [Wang, Zhanyi (2021). “On The *Tale of Genji* and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3): 47-53+158.]
- 严绍璁、刘渤 (1999): 《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Yan Shaodang & Liu Bo (1999). *Chronicles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朱明霞、王明军 (2025): “溯源·兼容·发微: 古典小说主题式解读的有益尝试——评苗怀明主编《观世相: 古典小说里的浮生与世情》”, 《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1): 129-135  
 [Zhu Mingxia & Wang Mingjun (2025). “Traceability–Compatibility–Exploration: A Useful Attempt at Th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Novels—A Review of the book *Observations on the World: All Living People and Worldly Situations in Classical Novels*, edited by Miao Huaiming”.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1): 129-135.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15> ]